

人类学民族学关键词栏目主持人语

王建民

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人类学民族学概念似乎是词义最不一致的,或者说人类学民族学是拥有最多多义词的学科。若再扩展到比起概念略为模糊,也略为宽泛一些的“词”,或使用层次不同,或理论意涵和学术视野存在差异,从我们这个栏目标题中连用的“人类学民族学”这种学科界定及归属概念词,到学科使用的诸多词汇和词组,都充满了异义。学科从业者和学习者在研究和学习中不断地使用学科基本的、重要的概念,并将这些概念和理论的阐发、田野民族志的叙事联系在一起,产生出推动学科不断成长的学术成果。人类学家以关键词作为学术配置的基本要素,结合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理论思辨,力求论证和阐释民族志研究中发现和运用的新观点,增强学术产出性。

人类学民族学关键词之所以歧义众多,可以归结于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由于理论范式的变化和更替,学术不断成长。学者们不断重新界定重要学术词的意涵,创造出新词并提升其重要性,虽然某些词则可能重要性和使用率下降,但总体而言学术词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其次,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反思性逐渐加强,成为社会文化研究中具有较强洞察力的学科。关键词本身就贯注了对于既往学术的批判和反思,其变化和增长又是这种反思性的体现。最后,人类学民族学是极具实践性的学科。以田野民族志为重要特点的学科理论主要来自田野民族志,基于对社会文化现实问题的关怀,人类学民族学又必须面向应用性实践,也可以成为理论贡献的重要源泉。

人类学民族学关键词的数量和内涵都处于不断变化、完善、丰富、更替过程中,而该栏目特别强调关键词的中国应用。相信栏目的设立将有助于从关键词出发促进与国际学术界的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更重要的是应膺学术担当,培育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促进学术规范和学科进步,推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

本体论转向*

□朱晓阳,刘立杰

〔摘要〕 通过梳理不同本体论进路和进一步探索中国人类学的本体论视野,强调中国研究自己的知识来源及其实践动力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本体论转向是人类学的新趋势,它是由多源头的实践活动所引发的一次学科思潮,本体政治以及当下的积极行动人类学或直接行动都是其在现实层面的反映。当前来看,最主要的是以本体感知去看见传统人类学中的“事情”,即能够用本体论视角去对传统人类学中的族群、仪式、经济和亲属关系等问题重新解读,发现真问题。

〔关键词〕 本体论;学科进路;地势;文明论;民族志写作

〔作者简介〕 朱晓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立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邮编:100871。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21)01-0008-07

一、定义与相关表达
人造物在文化生产中作用的重视。它一方面强调人类学语境下的“本体论转向”是转向对客体和注“实在”,另一方面则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流行

* 本文为关键词体例的简写,主要内容来自朱晓阳:《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向》,《社会学研究》,2021 年第 1 期。

的反思人类学及其引发的“表征危机”的回应。按照伦敦大学霍布拉德和哥本哈根大学裴德森的说法:人类学本体论研究是从“如何看物”这一类认识论问题转向关于“看见什么”的本体论问题。^①近年来,贴上“本体论转向”标签或是与之相近的提法还有很多,如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② 地缘本体论(geontology)、^③ 对称性人类学(symmetrical anthropology)、^④ 本体论政治(the politics of ontology)、^⑤ 地志转向(topographic turn)、^⑥ 栖居视角(dwelling perspective)、^⑦ 可供性(示能性)视角(the perspective of affordance)、^⑧ 非认识论相对主义、^⑨ 结构本体论(structural ontology)^⑩、客体指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⑪ 等等。总结下来,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大类:广义的包括各式本体论指向的论说,狭义则指受到法国结构主义影响的视角主义、结构本体论和对称人类学等。^⑫

二、概念提出和引入

有关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研究始于“反—反思人类学”、破除“表征危机”和避谈认识论,具体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或者更早,但有两次学术会议归纳了这一类研究和学科倾向并提出了纲领性的概念“本体论转向”。2003 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召开社会人类学年会,巴西学者德·卡斯特罗发表题为“AND”的

讲演,并提出“本体论人类学”的号召,会后引起学界强烈反响。在此前后,有关整体论进路、物的研究、栖居进路、地志学转向、科学技术研究(STS)等相继引入中国,并部分得到翻译,最重要的是被国内学界开始归类,开始划为与人类学本体论相亲近的一类研究。2013 年美国人类学学会(AAA)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本体论转向再次得到集中讨论,^⑬ 在总结成果的同时也开拓了一个新的时期,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界开始高度关注本体论问题,大量译文、讨论开始出现,并且有了中国语境和更具现实意义的“区域文明论”^⑭ 及“地势政治”^⑮ 等研究。当然,应当指出中国学者的本体论研究并非是对海外研究的简单追随与反应,而是有着自己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动力。例如“文明论”是以广义的人文关系学,即包含人、神、物的共同体来拓展传统“社会”的概念;^⑯ 而“地势”则与 20 世纪 40 年代金岳霖的“势”相契合,前者受到当时实在论语言哲学的影响,后者正是从实在论哲学的对话开始。^⑰

三、理论创建与学科溯源

要想准确地指出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始作俑者和理论奠基人甚是困难,因为其理论来源复杂多样,具有不同的学科内在动力。如果说反思人类学关

- ① Martin Holbraad & Morten Axel Pedersen, *The Ontological Turn: An Anthropological Expo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5.
- ② V Eduardo iveiros de Castro, “Perspectival Anthropology and the Method of Controlled Equivocation”, *Tipiti: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nthropology of Lowland South America* 2.1(2004).
- ③ Elizabeth A, “Povinelli, Geontologies of the Otherwise”, January 13, 2014.
- ④ 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ans. Catherine Porter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 ⑤ Martin Holbraad, Morten Axel Pedersen, “The Politics of Ontology”, January 13, 2014.
- ⑥ Kirsten Hastrup, “Social Anthropology: Towards a Pragmatic Enlightenment?”, *Social Anthropology* 13.2(2005).
- ⑦ Tim Ingol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⑧ Webb Keane, “Perspectives on Affordances, or the Anthropologically Real: The 2018 Daryll Forde Lecture”,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8.1-2(2018).
- ⑨ 朱晓阳:《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 ⑩ Philippe Descola,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ed”,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6.3(2016).
- ⑪ Graham Harman, *Tool — Being: Heidegge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s* (New York: Open Court, 2002).
- ⑫ Eduardo Kohn, “Anthropology of Ontolog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4(2015).
- ⑬ 参见霍布拉德和裴德森为年会圆桌讨论的主持词,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eries/the-politics-of-ontology>.
- ⑭ 王铭铭:《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民族研究》,2015 年第 3 期。
- ⑮ 朱晓阳:《地势与政治:社会文化人类学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 ⑯ 王铭铭:《民族志:一种广义人文关系学的界定》,《学术月刊》,2015 年第 3 期。
- ⑰ 金岳霖:《论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注的焦点是在认识论上,那么本体论人类学则是转向客体和本体性问题。巴西人类学家威维罗斯·德·卡斯特罗算是较早和较为全面概括这一倾向与思潮的人。他指出:“我们应当从对关于民族志权威性的认识论批评转移到关于民族志异己性(alterity)的本体论决定,移到关于他者的本体性、自决概念的阐明,换句话说,移到对人类学的同义词意涵比较(或拓展)描述再定义。”^①

纵观全局,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有这样几条学科进路:其一是受现象学、发展心理学和生态心理学影响,如英戈尔德所提倡的栖居视角;^② 其二是语言分析哲学,特别是戴维森等后经验主义哲学影响的地志转向、地缘本体论、整体论或非认识论相对主义等;^③ 其三是科学技术研究;其四是人类学对“物”的研究传统及延续,例如客体指向本体论等。^④ 如果从现象学和结构主义两极来区分,一大类是以图式为核心的结构本体论,包括法国—美洲视角论和戴维森哲学影响下的非认识论相对主义或整体论;另外一大类是以可供性/示能(affordance)为基础的栖居进路和示能进路。^⑤ 但是本体论人类学并没有清晰的站队,各种主张和学科进路都是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

四、分类和发展

不同学者对于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已有不同的分类(如孔恩(Kohn)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本体论,并以法国—结构主义影响的论说(主要是南美洲人类学)作为主流,是为狭义,其他为广义。而霍布拉德(Holbraad)和裴德森(Pedersen)用“其他本体论”和“我们的本体论”来区分,后者包括瓦格内(Wagner)、斯

特拉森(Strathern)和威维罗斯·德·卡斯特罗。^⑥ 而赛尔孟德(Salmond)以及马丁·帕累克(Martin Paleček)和马克·赫斯约德(Mark Risjord)的梳理则将包括戴维森(Davidson)在内的语言哲学家影响下的人类学也包括进去。^⑦ 最近有一篇考古学领域关于本体论的文章,将本体论转向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是世界观—焦点(worldview focused),第二种是关系—焦点(relations focused),第三种是世界—焦点(worlds focused)。^⑧ 在笔者看来,第一种本体论与其他长期存在的研究“现实”或实体问题的文化人类学并无差别。例如都会关心物体(考古发现的人造物等)的象征意义。第二种则相当于本文所概括的现象学进路;第三种则是来自结构主义影响的进路。),本文分类与梳理将体现中国学界对本体论的关注和视野,尽可能涵盖更多关系相近的进路。

第一种进路是当下影响最大、几乎成为本体论转向旗帜的结构—视角论,或称“狭义的本体论转向”。这一路径本身也比较复杂,但都与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相关联。其中以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的“结构—本体论进路(Structural-ontological Approach)”和威维罗斯·德·卡斯特罗的视角论作为代表。德斯科拉的核心概念“图式”(schemas)是结构主义的直接延伸,是一种将结构主义与格式塔心理学结合的模式。他用图式和“示能”(affordance)再结合,扩展到非人领域,从而将心智等延伸到非人类。然后再以结构主义的二项对立及转化形式,确定与图式相关的“识别”(identification)模式,将识别模式按内在性(interiority)和物理性(physicality)两个对立项间的连续/非连续区分,得

①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Who is Afraid of the Ontological Wolf? Some Comments on an Ongoing Anthropological Debate”, *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33.1(2015).

② Tim Ingol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③ [美]唐纳德·戴维森著,牟博选编:《真理、意义与方法——戴维森哲学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④ Harman, Graham, *Too — being: Heidegge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s* (New York: Open Court, 2002).

⑤ Keane, Webb, “Perspectives on Affordances, or the Anthropologically Real: The 2018 Daryll Forde Lecture”,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8.1—2(2018).

⑥ Holbraad & Pedersen, *The Ontological Turn: An Anthropological Expo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5.

⑦ Salmond, “Transforming Translations(Part 2): Addressing Ontological Alterit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4.1(2014):155—187; Paleček & Risjord, “Relativism and The Ontological Turn within the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43.1(2012).

⑧ Craig N Cipolla, “Taming the Ontological Wolv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21.3(2019).

到四种不同本体论模式:泛灵论、图腾主义、自然主义和类别论。亚马逊—安第斯地区传统的泛灵论对以德·卡斯特罗为代表的视角主义具有直接影响,他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多义性”(equivocation),出现在“同一文化(语言)”但其身处不同世界(自然)的情况下。^①例如当亚马孙—安第斯人和外来的左翼运动伙伴都使用 land(土地)一词来交流时,这个词含义实际上是多义的,在左翼人士看来是 land rights,而在土著人则是 earth—being(大地之在)。按卡斯特罗的看法,这种词义含混“不是单纯的理解失败……它与对待世界的想像方式无关系,而是与被看见的真实世界有关”。卡斯特罗因此认为,翻译是为了显露差异;而人类学民族志应强调“民族志差异”(difference)或他者性(alterity)。^②

第二种进路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对称性人类学和科学技术研究(STS)。它与南美结构—视角论关系紧密,但是将拉图尔的人类学放在其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开始的科学技术研究进路中来看更合适。STS 从“物”(thing)出发,主张实体(包括人造物)是“演成的”(enactment)。^③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是 STS 的核心。按照这种理论,物也是行动者。行动者不再局限于人类中心主义。与 STS 关系较近的则是客体指向本体论。^④这些路径都从“物”出发。

第三种进路是英戈尔德和韦布·肯恩(Webb Keane)的现象学指向本体论。在本体论转向潮流中,现象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方法论来源。其中尤以海德格尔影响为大。英戈尔德对海德格尔的“栖居”一词重新诠释,称之为“栖居视角”。^⑤英戈尔德和肯恩都分别使用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的核心概念 Affordance(可供性/示能)来描述概念图式或倾向性的形成。英戈尔德和肯恩的可供性—栖居进路与基于图式的结构—视角论形成对立的两种本体论进路。^⑥

第四种本体论进路来自语言分析哲学,特别是戴维森哲学的影响。这种进路与前述路径最大区别是从认识论出发,公开坚持自然主义为大前提的学说,并从讨论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认识论开始。具体来说,它关于本体论的讨论是从破除经验论的教条——概念图式二元论开始。戴维森指出,在放弃关于图式和世界的二元论时,我们并没有放弃世界,而是重建与人们所熟悉对象的没有中介的联系,这些对象本身的行径使我们的语句和意见为真或为假。戴维森关于“没有中介的联系”的说法成为其支持本体论转向中反表征的依据。而他晚期关于解释和理解的三角形关系(戴维森提出,获得知识之“真”的三角形关系包含:“表达者”“解释者”、同样事件和客体。从视角论人类学的角度,三角形顶端的“世界”——同样的事件和客体——是多元的。其多元性是由于人进入世界的视角不一样造成。这种差别的视角与“身体”的差别有关系。)则成为其与视角论(戴维森哲学与视角论、多元本体论相通,他指出“同样的事件和客体”——其意义部分取决于外部条件,部分取决于关系、文法、逻辑等。此外,决定“同样事件和客体”意义的“关系、文法、逻辑”在不同的社群中,甚至同一社群中有差异。这种由客体、关系和语言等构成的“同样事件和客体”,因而是“多样本体的”。他的一些言论,如“宣布下述很令人愉快的消息也同样是错误的:一切人,即至少是一切运用语言的说话者,都具有一种共同的概念图式和本体论。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可理

① 德·卡斯特罗将结构主义反转,认为能指是“自然”的(多样的)有具体指向的,所指是“文化”的(单一的)。这样一来就有了从“多元文化、单一自然”的人类学信条,反转到“多元自然、单一文化”的视角论主张。参见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Who is Afraid of the Ontological Wolf? Some Comments on an Ongoing Anthropological Debate”, *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33.1(2015).

② Marisol de la Cadena, “Indigenous Cosmopolitics in the Andes: Conceptual Reflections beyond ‘Politics’”, *Cultural Anthropology* 25.2(2010).

③ Steve Woolgar & Javier Lezaun, “The Wrong Bin Bag: A Turn to Ontolog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3.3(2013).

④ Graham Harman, *Tool — Being: Heidegge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s* (New York: Open Court, 2002).

⑤ Tim Ingol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57—171.

⑥ Keane, Webb, “Perspectives on Affordances, or the Anthropologically Real: The 2018 Daryll Forde Lecture”,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8.1—2(2018).

解地说概念图式是不同的,我们也不能可理解地说它们是同一的”,^①这支持了他的哲学同多元本体论相契合的主张)相契合的地方。可以肯定:戴维森的哲学与乔姆斯基式的语言学相契合。这种路径与结构主义相似,认为存在深层语言结构,犹如图式一样存在。受到上述语言哲学讨论本体论问题思路的启发,有学者以“非认识论相对主义”来概括。^②

五、现实关照

本体论转向是由多重来源的现实活动所引发的,学界用“本体政治”来概括,以突显其与反(传统)表征政治^③在各地的新运动趋势相关。例如这些新的运动对传统左翼、新自由主义、环保主义、族群、性别等表征政治均不满意,希望摆脱现实中后殖民主义影响。按照拉图尔的说法,南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寻求如何在不互相消灭的前提下组成共同的世界”。这种动机来自因“生态变异加速而使其生活领域变得日益逼仄的居民”。^④南美洲的万物政治或土著运动就是一种本体政治,它从本体差异性提出政治主张,并被表述为土著政治,以示和之前政治运动的区别。德·拉·卡迪娜(Marisol de la Cadena)认为,万物政治的出现开启了一种不一样的政治,其诉求的多元性不是因为他们打着性别、种族、族群性等旗号,或是代表自然的环境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将“大地之在”带入政治。在土著运动中,“物”不仅仅指非人类的东西,相反它们也是感受性实体。土著运动能够强化政治本体的多元化,而这种政治多元

化是要将以往基于“单个世界”的政治转变成复数世界内的“对一反”关系之可能。如前述,复数的世界正是南美视角论的一个基本主张。^⑤

还有一类本体政治的现实活动是与斯科特传统抵抗进路不一样的“直接行动”和民族志作者参与的“积极行动人类学”。^⑥代表人物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近年在评述法国黄背心运动时说,过去的“垂直”或先锋队组织模式已迅速让位于一种水平状的风格,其中民主、平等的实践和意识形态最终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无法理解这一点的人就会错认为像“黄背心”那样的运动是反意识形态的,甚至是虚无主义的。直接行动和貌似“反意识形态性”正是本体政治的当下特征。此外,这些新政治都或多或少具有特定地方内的水平状特征。这与传统的左翼和环保运动的跨地域和“垂直性”不一样。^⑦实际上推动这种政治的现实张力及冲动已经在将近二十年前出现。人类学在这方面的敏锐把握当属伊丽莎白·柏文尼里(Elizabeth A. Povinelli)的“激进世界:不可共度性和不可思议性的人类学”一文。^⑧这篇文章正是采用戴维森的“彻底解释”这个核心概念,探讨在“radical worlds”(激进世界)中的跨文化不可共度性问题。该文认为,戴维森的彻底解释虽然从认识论方面消除了不可共度性问题,在现实中却产生了互相不可共度的世界(复数)。

与积极行动人类学发生在同一时期,中国人类学亦有类似经历。今天与本体论转向相近的最初自觉,

① [美]唐纳德·戴维森著,牟博选编:《真理、意义与方法——戴维森哲学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74页。

② “非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意指在认识论层面不存在不可互译的概念图式或语言,但在“实在”或“本体论”层面却会有差异性(朱晓阳:《地势、民族志和人类学本体论转向》,《思想战线》,2015年第5期)。

③ 用“表征政治”来指称传统运动只是一种简便说法。实际上无论过去和现在,任何运动都有表征。用政治学家 Murray Edelman 关于政治象征分类的话说,本体政治的表征/符号是指涉性的(referential)或具体的,而传统运动(特别是其目标抽象的运动)的表征/符号往往是抽象的或凝聚性(condensational)的,具体论述见 Murray Edelman,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4)。

④ Bruno Latour, “Another Way to Compose the Common World”,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4.1(2014):301—307.

⑤ Marisol de la Cadena, “Indigenous Cosmopolitics in the Andes: Conceptual Reflections beyond ‘Politics’”, *Cultural Anthropology* 25.2(2010):334—370.

⑥ Sherry B Ortner, “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 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6.1(2016):47—73.

⑦ [美]大卫·格雷伯著,曾嘉慧译:《大卫·格雷伯谈“黄背心”运动:我们脚下的大地已经偏移》,《澎湃思想市场》(微信公众号:sixiangshichang),2018—12—10.

⑧ Elizabeth A Povinelli, “Radical Worlds: The Anthropology of Incommensurability and Inconceivabil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0(2001):319—334.

一方面来自对“社会转型”(包括城市化)和发展实践引发的现实问题思考;另一方面则受到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追求的影响。例如相关学者在 21 世纪初发现国有企业改制中发生的“救家园”和“保卫家园”行动与传统运动的差别。^① 后来,又注意到中国的“发展干预”与反思人类学影响下的国际发展话语和实践之间的分歧。^② 近年来,国内舆论和自媒体平台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直接政治”的公共事件,例如“雷洋事件”和“辱母杀人案”等,这些事件是突然发生、以社交媒体为聚集场所、没有组织者、诉求直接和直指具体事项的解决。它们没有传统运动的意识形态表征,一旦达成事件解决,不满或抗议便自动消散。

上述这些发生在近二十年来的事件或实践,表现出与传统表征政治不一样的性质,它们可用“本体政治”来概括。这些各异的社会现象有一些共同特点,例如反对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全球化,强调地缘政治,回应蓝领或社会主流中的底层声音、认可宗教及其组织对政治影响的合法(例如基督教之于美国)、强调民族—国家是政治的本体等。

六、中国实践

首先,中国的本体论人类学探索,没有像诸如视角主义和科学技术研究那样抛弃认识论问题。学界讨论本体论最初的一种论说称为“整体论”,后来改称“非认识论相对主义”“地志学”或“形态学”,最终以中国语境的“地势”为核心概念。^③

应当强调,不能将中国人类学的本体论探索当作海外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追随或反应。中国人类学的本体论感知具有自己的知识来源和实践动力。例如地势本体论与 20 世纪 40 年代金岳霖的“势”之间

在进路和内容方面相互契合。^④ 前者是受到当代实在论语言哲学影响,后者则从与 20 世纪初的实在论哲学对话开始。又如受到费孝通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之号召和影响,王铭铭主张以动为本的钱穆“生生论”传统,从而克服包括视角论在内的“静态主义本体观”。^⑤ 此外,王铭铭也以“广义人文关系学”,即包括人、神、物的共同体,来拓展传统的“社会”概念。其他较长时期以前便有的本体论探索包括对于“物”和文明人类学的研究,以及中国城市化中的法律和政治问题引起的对场所和空间的聚焦等。^⑥

另外,对于当下中国人类学而言,更重要的是以本体论感知(ontological sensibility)去看见传统人类学的“事情”,使之拓展、深化,使过去路径下所遮蔽的真实得以显露。沿着这一思路,近年来已有不少成果,如余昕关于燕窝的研究,所关注的虽然从传统上说是食品(燕窝)产业链的研究。但是本体论感知使其多了“物—燕窝”的演成事实。^⑦ 白美妃关于县城—乡两栖的研究也显示出本体论视角对于城乡关系观察的优势,它越过大多学者只关注的制度变革维度,看到县域内城乡一体化社会形成的时空经验的重要变化。^⑧ 林叶的“临时生活正常化”一文通过“测度”拆迁遗留地带中钉子户的日常生活实践,探究他们如何在治理者有意地疏忽下捕捉机会、建立新的社会空间以使临时生活正常化。^⑨

还有一类关注基础设施、地景或空间、建筑物对于社会—政治的影响,如周永明的“路学”研究。^⑩ 刘超群关于闽西古村落传统民居的改造案例。^⑪ 陈亮用“以势谋地”为题研究城市地摊,关注摊主是如何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扎下根与实现再地域化的。^⑫ 李耕以福建永泰庄寨为例,说明在规矩、示能和氛围三

① 朱晓阳:《误读法律与秩序建成:国有企业改制的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5 年第 3 期。

② 朱晓阳、谭颖:《对中国“发展”和“发展干预”研究的反思》,《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 4 期。

③ 朱晓阳:《地势与政治:社会文化人类学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④ 金岳霖:《论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⑤ 王铭铭:《联想、比较与思考:费孝通“天人合一论”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学术月刊》,2019 年第 8 期。

⑥ 王铭铭:《民族志:一种广义人文关系学的界定》,《学术月刊》,2015 年第 3 期。

⑦ 余昕:《燕窝贸易与“海洋中国”——物的社会生命视野下对“乡土中国”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⑧ 白美妃:《家,撑开在城乡之间——县城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

⑨ 林叶:《“废墟”上的栖居——拆迁遗留地带的测度与空间生产》,《社会学评论》,2020 年第 4 期。

⑩ 周永明:《汉藏公路的“路学”研究:道路空间的生产、使用、建构与消费》,《二十一世纪》(香港),2015 年第 148 期。

⑪ 刘超群:《栖居与建造:地志学视野下的传统民居改造》,《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 1 期。

⑫ 陈亮:《以势谋地:移民的城市空间生存和生计策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个维度上,建成环境对社会以及记忆、身体等发挥着作用。^①有关这一类研究更多的例子可以参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文章,以及2019年4月重庆大学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人类学民俗学中心共同主办的“本体论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究研讨会”会议论文。

七、意义、价值与问题

上文关于中国实践的例子中,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且运用到本体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例如以本体论感知去看传统人类学的事情,使之拓展、深化,让过去路径下所遮蔽的真实得到显现。

本体论引发的另一种探索是关于民族志书写。与上一条启发“看见真实的事情”相对,这里的问题是如何“说出真话”。这也是基于中文日常语言的民族志书写应有的自觉,因为日常语言视角意味着民族志将使用“近经验”概念。传统的民族志写作在反思人类学之前,基本上会秉持格尔茨关于近经验和远经验相结合的立场及相应路径。这其实是更久远的主位和客位相结合主张的延续,也是政治法律人类学中民俗体系和分析体系结合主张的延续。格尔茨曾经说过:民族志在抒写巫术的部分,不需要像巫师写的一样。^②在他看来,民族志作者的任务是用远经验解释文化内部持有者的解释(或表征)。在此意义上,巫师与民族志作者之间的差别是“表征”。而非认识论相对主义视角或日常语言视角论的角度,两者的差别

可能来自各自不同的世界体验和视野所见,其相应的不同语言述说是基于本体性的差异。由于述说视角差异的语言也是“身—视角”的一部分,因此语言,特别是“述说”,是生活形式或实在的一部分。再加上,来自日常语言哲学的成果表明,即使“写得像巫师一样”也不存在不可翻译这种问题。因此,为了强调本体相对主义视角,同时也是强调说话者视角,现在应当将格尔茨的话反过来说:可以用巫师语言来写关于巫术的民族志。如采用南美视角论喜欢的逆反结构主义表达方式,则可以说:写出“能指”的民族志!

人类学本体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张延伸心智假说,即将心智存在拓展到非人的领域。但此处存在一个悖论是包括结构—视角论等主要(狭义)本体论研究不能解开的,即无法接受所谓非人与人拥有同样的“文化”。^③当代人类学本体论研究试图回归古典传统,以克服后现代思潮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表征危机带来的虚无争辩,试图将认识论当作无意义的问题撇弃,主张聚焦本体性/存在性问题,但认识论问题仍然如影随形地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概念使用中的问题:不应满足于搬用有关本体论的新术语,不能止步于用一些已经成为套话的词汇,如套用“示能”“行动者网络”等概念来解释传统人类学议题。再次指出,更有意义的是如何以本体感知性去看传统上属于仪式、经济行为、亲属关系或政治等民族志材料中的事实。☒ [责任编辑 郭云涛]

① 李耕:《规矩、示能和氛围:民居建筑遗产塑造社会的三个机制》,《文化遗产》,2019年5期。

② Clifford Geertz,“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57.

③ 语言哲学很早就分析过这种延伸心智的论说会陷入的棘手问题。例如,内格尔关于成为一只蝙蝠会怎么样的讨论。丹尼特关于一头狮子可能会讲话,但无助于人理解狮子等等。丹尼特说:“如果狮子可以讲话,我们会很好地理解他,只是那对我们理解狮子毫无帮助。”“他与普通狮子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无法告诉我们做一头狮子是什么样的体验。我认为我们应该习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人类概念只能被部分地应用到动物身上。”具体参见 Thomas Nagel,“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Philosophical Review* 83.4(1974):435—350; Joshua Rothman,“Daniel Dennett’s Science of the Soul: A philosopher’s Lifelong Quest to Understand the Making of the Mind”, March 27, 2017.